

反叛·回归： 克鲁亚克小说的禅宗思想探析

谢志超

(东华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杰克·克鲁亚克是垮掉一代文学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自我流亡与放逐,反传统反社会,以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对抗传统的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克鲁亚克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他探寻新的生活模式,向东方文化寻求启发,参禅静坐,将禅宗思想与小说创作有机结合,在失望与痛苦的边缘寻求自我救赎和解脱之路,实现终极意义上的个体自由。

关键词:杰克·克鲁亚克;禅宗思想;反叛;回归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2-0092-05

1950年代,垮掉一代运动兴起于美国,它既是一场社会运动,亦是一场特殊的文学和文化运动。克鲁亚克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其特立独行的生活准则与处世方式饱受争议。他醉心于东方文明,游历高山深谷,既参禅悟道,又吸食毒品,滥交朋友。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锋,在自传体小说中记录了一群年轻人在不知终点的旅途上探索自然与自我的终极意义。在某个层面上而言,克鲁亚克所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反社会的言语与行为,确实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特殊年代,以克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一代敢于袒露自我,揭露和批判美国社会政治与现实,寻求东方文化,评论家科菲认为他们“不是在逃避生活,也不是在逃避某种事物。他们在探索比圣杯更深层的精神”^{[1]229}。

自1960年代垮掉一代译介到中国,许多学者都对之展开了研究。从最初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到综合的文本和文化研究,克鲁亚克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作者传记研究、文本分析以及跨文化研究。文

楚安在他的系列论文中深刻系统地将一个思想丰富的克鲁亚克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2-3],是中国垮掉一代研究的开拓者。继文楚安之后,肖明翰发表了克鲁亚克研究的论文^[4-5],一方面客观评价了克鲁亚克的反社会行为,一方面赞扬了他的探索与革新精神,是对文楚安研究的继承和发扬。近10年来,克鲁亚克作品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达20余篇。其中,卢亚林、王元陆、王海燕等从主题、人物、文化等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了其成名作《在路上》,意义重大^[6-8]。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增进,有关克鲁亚克及其作品的跨文化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很多学术论文都提到了克鲁亚克对禅宗思想的热爱,但并没有做系统研究。2009年孙娜发表文章,以文本分析为主,探讨了《达摩流浪者》的创作背景和主人公雷蒙对禅宗思想的感悟^[9]。遗憾的是,该文局限于《达摩流浪者》文本分析,未能涉及克鲁亚克的其他作品,也未能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更深层次地从理论上论证克鲁亚克的禅宗思想渊源。克鲁亚克本人深受禅宗思想影响,他的很多作品都蕴含了深刻

收稿日期:2009-12-04

作者简介:谢志超(1976—),女,湖南邵阳人,博士,东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

的禅理。如何从比较文学的视域解读克鲁亚克和垮掉一代,是东西文化对话过程中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克鲁亚克认识并接受完全不同于天主教精神的禅宗思想,将禅宗思想为我所用,实现东西文化的互动,这为克鲁亚克研究和东西文化对话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范例。

一 “遭遇”禅宗思想

文楚安评说垮掉一代的反社会行为,认为,既然他们“无法改变世界,那么个人的出路要么用吸毒来改变对世界的看法,要么试图从宗教信仰中去得到解脱”^{[10]47}。作为垮掉一代运动的领军人物,克鲁亚克在个人的价值观念与现行的社会体制无法兼容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禅宗思想。禅宗主张禅定,以觉悟众生本有之佛性为目的,主张“即心即佛”、“顿悟见性”、“解脱不离世间”。因世间一切诸法都不离自心自性,而人们却为烦恼惑障所遮蔽,故不能了悟本心本体本来是佛。若人们了悟自心自性本来是佛,只要来源自心上顿现真如佛性,即可成圣作佛。

克鲁亚克认识禅宗思想既是偶然亦是必然。克鲁亚克生活的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传统的价值观与现行的社会制度不为年轻的一代所接受,新的体制迟迟不见确立,政府无能为力。许多年轻人处于迷惘与困惑当中,倍感生活没有希望。面对无望的现实和无能的政府,克鲁亚克拒绝参与美国的生活方式,反对社会不公平,反对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异化,主张在生活方式和作品创作上摆脱形式的束缚,追求自由与自然的境界。克鲁亚克逐渐对禅宗思想产生兴趣,崇拜中国疯僧寒山子,四处游历,探访名山幽谷,反复阅读《楞伽经》、《金刚经》,怀特·戈达编辑的佛教文选《佛教圣经》从不离手。他参禅、静坐、冥想,期望以此打开感官之门,从中寻找生活的答案。克鲁亚克热爱禅宗经典,写下了大量有关佛教感悟的手稿。克鲁亚克用禅宗的思维方式探索生活的理念,以不同于西方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将自己从各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直接获得生命的体验,探寻“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信仰、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社会关系”^[4]。

禅宗思想契合了克鲁亚克的人生哲学,使他从喧嚣的俗世中解脱出来,还满足了他对创作灵感的需求。克鲁亚克的身边有一群热衷禅宗思想的朋友,包括著名的垮掉一代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虔诚的禅宗信徒加里·斯奈德、尼尔·卡萨迪等。他们

虽然遭受身份认同的冲突,但仍然保持自己的个性,最终获得自我认知和重生,他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一代美国青年。克鲁亚克以自我与朋友为原型,创作出了他引以为豪的著名的“杜劳斯传奇”自传体系列小说。他主张在没有任何束缚的状态下,以“自发性写作”为中心,忠实于自己的感受,重视心灵的顿悟,寓禅宗思想于作品创作,由此开创了一条在作品中寻找精神寄托和信仰归宿的新的创作时代。

二 凄凉的回归

垮掉的一代面对社会的无序和自我的无能,“除了逃避,逃向幻想,逃向地平线,逃向身体,逃向性,逃向人群,逃向毒品”^{[11]100},别无选择。被逼上绝路之后,克鲁亚克决定以自己的真诚之心去追求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看世界”,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12]220}。他用特殊的陌生的方式来度量自我与外部世界,同时又将自我带入了从未涉足的思想领域。

克鲁亚克的创作主题来源于美国本身,他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一群不为世俗所接受的新生一代美国人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人物有流浪汉,有长期在外的工人,也有不安于现状的反叛者们,他们要么不知疲倦地奔波在路上,要么刚刚从旅途归来,准备朝下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出发。这些人物对生活充满了失望,但从不绝望。他们疲惫不堪,却找不到回家之路,因此不断地行走在路上,与孤独、贫困相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拥有真实的自我,才能“拥有一群无家可回的弟兄,真正地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13]xvii}。《在路上》的主人公萨尔和他的朋友迪安为了追求个性与自由,一路上寻欢作乐,又高谈东方禅宗。他们迷失在旅途中,“只觉得仿佛自己是另一个陌生人,一个陌生人”^{[14]21}。短短几言勾勒了萨尔的无奈和无助。他们无家可归,前途未卜,只能漫无目的地旅行,永远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道路^{[14]321}。《达摩流浪者》少了一份喧嚣与躁动,克鲁亚克不惜笔墨描绘了一幅幅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揭示了作者对旅行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并期望发动一场背包革命,至于革命的目的,克鲁亚克并没有明确地给出答案。他希望数以千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青年有一天会背着背包,像萨尔那样自由地在全国各地旅行。但是,并不是每一次旅行都能轻松地欣赏风景,更多的则是凄凉和无奈,就像《孤独旅者》里的“我”。越是和谐与温馨的场景越能刺痛脆弱的内

心,痛苦与孤独愈加深刻。这种痛苦,源于对生活的无望:“我的生活是一场巨大的精神错乱,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如同虚空,如同轮回”^{[15]13}。《荒凉天使》精确地记录了克鲁亚克不堪回首的生活经历,讲述了他远离亲朋好友,在荒凉峰顶陷入对世界“虚空”和“无限”的沉思以及对人际关系的思量,不断地徘徊于生存与毁灭、今生和来世的十字路口,用大量的诗歌来宣泄内心的痛苦:“杳杳极光/照临霍佐敏——/虚空更寂然”^{[15]17}。无论是萨尔,无名无姓的“我”,还是杜劳斯,他们既是作者虚构的人物,又是克鲁亚克自我的写照。他们居无定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抗社会、对抗人类。他们的旅途没有起点,没有终点,似乎生命的意义只是为了行走在路上,远离尘嚣,远离现实。他们甚至自我解嘲,认为人生就应该如此,“一生至少应该经历过一次健康的甚至令人厌烦的在蛮荒地带的独处,发现他自己孤独地只依靠自己,于是知道了他自己的真实和隐藏的力量”^{[16]149}。

表面上看,克鲁亚克和他笔下的人物永远不知疲惫地穿梭于全国各地,寻找刺激,酗酒吸毒,寻欢作乐,过着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逃离人群,逃避责任和义务,他们对社会充满了失望和指责,他们的很多行径突破了法律和道德的底限而为世人所不能理解甚至遭到强烈的批判。他们的生活方式呈现的种种过度反常、感官宣泄、极端的神经质,都有深层的信仰支撑和深远的目的追求。他们正是用这种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方式寻找自己的信仰,希望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回归之路,虽然“不足以有助于重建新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10]27}。

在喧嚣与热闹的背后,克鲁亚克用淡淡的语调沉重地道出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一代人的矛盾心理和渴望精神寄托的愿望。他们虽然认为旅行能满足某种心理需求,但更期待来自他人、来自家庭的最普通、最真实的温暖和最起码的身份认同。迪安有家有孩子,可他几乎不着家门,似乎从来都不知道家的温情。他内心孤独,总是将行李塞在床底下,随时准备离开或者被赶出他自己的家门。孤独的萨尔忙于奔波,直到有一天突然听到“洛杉矶”这个熟悉的名字,他才意识到自己真正在寻找什么。《在路上》的结尾,克鲁亚克选择了让迪安独自离去,而萨尔重新开始他的中产阶级生活。至于长期留守在孤凉峰的

杜劳斯最终明白孤凉峰的孤独与寂寞是它与生俱来的,而人不能逃避也不能离开现实的,他结束了浪迹天涯的生活,带着满身的尘埃和疲惫踏上了归家之旅。雷蒙不是一个避世者,亦不喜欢漫无目的的旅行,他只想着回归到真实的尘世中去,那才是他的庇护所,“就像慧能的母亲,能以一种真正的禅性开启任何的心灵,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能让他们恰如其分、各得其所地生活”^{[15]314}。现实往往充满了无奈。回归的雷蒙再次体会了生活的艰辛,他只能带着母亲远离城市,过着宁静而又悲哀的生活。“我已经够了,我放弃,我退出,我要回家,把我带回家吧”,“把我带到一切都是和平和友善的地方,回到生活的家庭里”^{[16]211}。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际关系的淡漠,使得个人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的愿望很难实现,他们得不到家庭或者社会的认可,只能选择这样或者那样的生活方式,获得短暂的宁静,或者选择继续漂泊,其结局难免凄凉。

克鲁亚克毕竟不是悲观主义者,他似乎从禅宗思想里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决定开辟另一条回归之路。虽然没有亲力亲为,克鲁亚克以斯奈德为原型,塑造了另一种回归形象——远渡重洋去日本学习佛学的贾菲。和其他的人一样,贾菲曾经四处漂泊,忙于和朋友们酗酒、聚会、爬山,探讨禅宗。但他热爱寒山子,热爱拾得,更加热爱“愿归命于佛陀神圣念珠里的空”。与其说贾菲离开了雷蒙这群朋友,不如说他离开了生他养他却又令他极度失望与痛苦的故土,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庇护之地与回归之路。贾菲这位虔诚的“达摩流浪者”,以其特殊的世界观探索着生命的直觉、纯净与安宁,他曾经经历过马拉松式的狂欢与纵情的“雅雍”,他又像一名托钵僧人浪迹天涯。历经了马特峰与孤凉峰的清涤,世界逐渐变得通透清晰,和贾菲一样,克鲁亚克明白了自己真实的内心。

三 禅我合一

在一次接受访问被问及宗教感悟的时候,克鲁亚克回答道:“我所认识的禅宗思想部分地影响了我的创作,你们可以称之为宗教的或者狂热的、虔诚的信仰,就像我信仰天主教一样”^{[17]123-124}。而问到耶稣和佛陀的差别,他干脆地回答到“二者没有任何差别”。克鲁亚克从来都没有否定自己的信仰,也毫不避讳在公众场所探讨禅宗思想。克鲁亚克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出生时是个天主教徒,生长在天主教

的家庭,死的时候仍然是天主教徒。他对佛教的兴趣是因为他发现了宗教的不同,这对他的宗教感悟有所帮助”^{[17]123}。克鲁亚克用一种非佛教徒的方法理解佛教,他是一个伟大的探索者,一直在探索“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应该活下去?”等问题,也在探索天主教出生的他如何真实地面对佛教等问题,虽然他从来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

克鲁亚克探索佛理,将各种文化因子糅合在一起,他的创作是现实与虚幻的结合,又是自我与禅宗的交融。萨尔、雷蒙、杜劳斯、“我”,既是克鲁亚克本人及周围人群的真实写照,又是那个年代垮掉一代的集体参禅者形象。克鲁亚克用纵横交织的手法表达了杜劳斯对禅宗的理解和体验:一是生存的痛苦与绝望,一是虚空的顿悟与回归“我突然顿悟:‘是我在变化、在行动、在往来、在抱怨、在伤害、在欣喜、在喊叫,是我而不是虚空’”^{[15]5}。在多次阅读《金刚经》后,杜劳斯会潜意识地提及生灭无常,梦境、幻象、浮泡、虚空、朝露、闪电此六观,一切“如梦幻泡影,电光刹然逝”。《达摩流浪者》更像一部佛经辞典,《达摩流浪者》被克鲁亚克认为是“《在路上》的续集”^{[17]151},评论家罗斯(Nancy Wilson Ross)则认为这部小说有别于其他作品,因为“雷蒙和他的达摩朋友们的行为更加积极乐观。他们不再热衷于时下风靡的爵士乐,用一种成熟的方式探讨禅宗,他们不再吸食毒品,取而代之的是喝茶这种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18]157}。但《达摩流浪者》更像一部佛经辞典,“菩萨、前世、因果报应、等待,定,三昧、轮回、佛性”等佛教用语不断地出现在雷蒙和贾菲的对话中。他们研读佛经,打坐冥想,探讨前世今生,感受世界的寂静与虚空,希望进入“达摩”的境界。

克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是自然的崇拜者,又是个人的放逐者。只有身处自然,他们才能感受到自我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大;也只有身处自然,他们才能彻底地将自我与禅宗融合在一起,真正领悟“空”的境界。雷蒙和贾菲结伴而行,一路攀爬令人生畏的马特峰,领略沿途美丽而又神秘的山间溪水、清风、变幻莫测的气温,并援引寒山的诗歌表达他们对自然的热爱与向往,“不管你是身在‘好地方’,还是爬在马特峰,都是同一个‘空’”^{[19]61}。当人们厌倦了文明,行走在深山野岭,放下一切,忘记一切,饱受尘世污染的灵魂得以安宁和洗涤。从这一点上来说,达摩流浪者的旅行既是流浪生活的开始,又是回

归自然的开始。《达摩流浪者》里的辛恩·莫纳汉,他效仿梭罗,远离社会,亲近自然,在自然中打坐参禅,与自然融为一体,真正体会了“空”的境界。

《达摩流浪者》贯穿着一种“生命无常、及时享乐”的克鲁亚克式的禅宗感悟。虽然研习禅宗思想,努力让自己的思想变得“空”,但克鲁亚克依旧经常挣扎于现实与虚空之间,“空即是空,是我所了解到的最悲哀的事实”。他选择了一种“中庸”的生活方式,将禅宗思想非常实用地贯彻到现实中来,一边在尘世里找寻真实的生活,一边用佛教的理念为自己开脱。贾菲一方面崇拜寒山子“孤独、纯粹和忠于自己的生活”,一方面周旋于不同的女性中间,还破天荒地女孩比喻为“黑暗虚空”、“菩萨”,令人啼笑皆非。克鲁亚克似乎默认了贾菲的生活方式。杜劳斯难以忍受的不仅仅是心理的孤独,还有身体的孤寂,他有意要让自己重新淹没于生活的洪流,现实生活里有姑娘们的温情,还有家庭的温馨。克鲁亚克甚至将“四大皆空”的和尚与酒肉联系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讨论般若。面对信仰与享乐的冲突,克鲁亚克最好的解释是“对性毫无成见的态度,正是我喜欢东方宗教的原因之一”^{[19]34}。就像早年巴勒斯预言克鲁亚克所言,他永远无法彻底抛弃世俗杂念:“佛教仅仅是一堆精神垃圾”,“一个真正的人如果仅仅依靠佛教或者其他的思想就能驱逐内心的痛苦而不再去爱或者被爱,在我看来,简直是亵渎神灵”^{[20]76}。巴勒斯并非要诋毁佛教,只是他似乎比克鲁亚克更能看透现实与人性,更能明白克鲁亚克需要什么以及不能放弃什么。

《达摩流浪者》出版不久,维京出版社的编辑米勒对之称赞不已,认为只有像克鲁亚克这样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才能写出“如此令人迷恋的自由和自我放逐”,“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流浪者,但从来没有一个像克鲁亚克这样的达摩流浪者”^{[18]157}。不管是真正领悟了禅宗的最高境界,还是有意误读禅宗思想,克鲁亚克以他独特的方式解读禅宗思想,并以非同一般的变通力将禅宗思想与美国文化杂糅在一起,实践着他的禅我合一。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暂时忘记了痛苦与失望。

禅宗思想改变了克鲁亚克的生活重心,改变了他的思维模式。在对现实极度失望过后,他开始学会平静地接受事实,接受社会现状,用一颗平常的心平静地反省自我,观察世界。克鲁亚克抱着审慎的

态度,在对禅宗思想有限的认识的基础上,为我所用,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把自我和禅宗思想结合起来,既满足了他的人生哲学,又丰富了他的作品创

作,给世人留下了一部部经典作品,为垮掉一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亦为今日的比较文学研究留下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 [1]玛丽琳·科菲.那些垮掉的一代[C]//王逢振.六十年代先锋译丛.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2]文楚安.“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和《在路上》[J].当代文坛,2000,(3).
- [3]文楚安.克鲁亚克遗产之争[J].外国文学动态,1999,(5/6).
- [4]肖明翰.垮掉的一代的反叛与探索[J].外国文学评论,2000,(2).
- [5]肖明翰.垮掉一代的精神探索与《在路上》的意义[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1).
- [6]卢亚林.反叛与妥协:《在路上》主题研究[J].当代外国文学,2003,(4).
- [7]王元陆.“垮掉”精神管窥——评析《在路上》的主人公狄安·莫里亚蒂[J].国外文学,2001,(1).
- [8]王海燕.从《在路上》看“垮掉派”的文化困境[J].当代外国文学,2008,(1).
- [9]孙娜.从《达摩流浪汉》看杰克·凯鲁亚克的禅学渊源[J].安徽文学,2009,(11).
- [10]文楚安.“垮掉的一代”及其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 [11]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M].北京:三联书店,2006.
- [12]王恩铭.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13]Ben Giomo. *Kerouac, the Word and the Way* [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4]杰克·克鲁亚克.在路上[M].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15]杰克·克鲁亚克.荒凉天使[M].姬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 [16]杰克·克鲁亚克.孤独旅者[M].赵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 [17]Matt Theado. *Understanding Jack Kerouac*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0.
- [18]An Charters, ed. *Selected Letters:1957-1969* [C].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99.
- [19]杰克·克鲁亚克.达摩流浪者[M].梁永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8.
- [20]John Tytell. *Naked Angels: the Lives and Literature of the Beat Generation*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Rebellion and Regression: Zen Buddhism in Kerouac's Works

XIE Zhi-chao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Jack Kerouac, representative of the Beat Generation, lives a life with banishment and exile. Kerouac is a person of counter-tradition and counter-culture, confronts traditional social systems and values with a Hippies life-style. Born a Catholic, Kerouac explores a new life mode, tries to gain a deal of enlightenment from oriental culture, practises meditations and combines Zen Buddhism with story writing. At the edge of pain and disappointment Kerouac tries to find of a way of self-salvation and moksha to achieve final individual freedom and regression.

Key words: Jack Kerouac, Zen Buddhism, rebellion, regression

[责任编辑:张思武]